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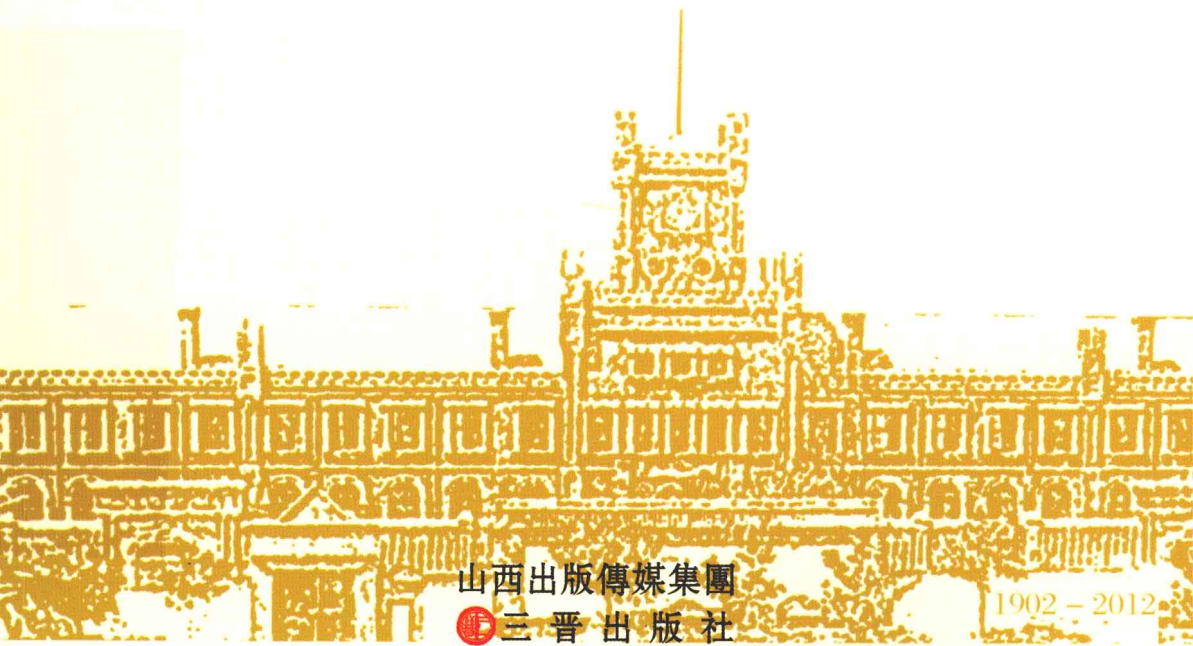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

唐诗与宋代诗学

TANGSHI YU SONGDAI SHIXUE

王 园 著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三晉出版社

1902 -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唐诗与宋代诗学 / 王园著. —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457-0534-8

I. ①唐… II. ①王… III. ①唐诗—诗歌研究②宋
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3602号

唐诗与宋代诗学

著 者: 王 园

责任编辑: 李秋芳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0351-4922203 (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嘉祥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534-8

定 价: 6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序言

2012 年 5 月 8 日,山西大学将迎来 110 年校庆。为了隆重纪念母校 110 年华诞,系统展现近年来山西大学创造的优秀学术成果,我们决定出版这套《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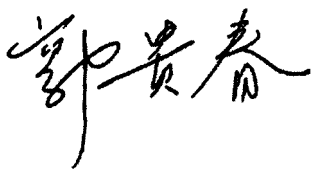
山西大学诞生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时代,在“西学东渐,革故鼎新”中应运而生,开创了近代山西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先河。百年沧桑,历史巨变,山西大学始终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学术实践,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办学业绩。百年校庆以来,学校顺应高等教育发展潮流,以科学的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创新,实现了新的跨越和腾飞,逐步成长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科研实力雄厚的具有地方示范作用的研究型大学,谱写了兴学育人的崭新篇章,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大学因学术而兴,因文化而繁荣。山西大学素有“中西会通”的文化传统,始终流淌着“求真至善”的学术血脉。不论是草创之初的中西两斋,还是新时期的多学科并行交融,无不展现着山大人特有的文化风格和学术气派。今天,我们出版这套丛书,正是传承山大百年文脉,弘扬不朽学术精

神的身体力行之举。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的编撰由科技处、社科处组织,将我校近 10 年来的优秀科研成果辑以成书,予以出版。我们相信,《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对于继承与发扬山西大学学术精神,对于深化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对于促进山西高校的学术繁荣,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谨以此丛书献给历经岁月沧桑,培育桃李芬芳的山大母校,祝愿母校在新的征程中继往开来,永续鸿猷。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郭贵春' (Guo Guochun).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cursive, flowing style.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目 录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序言	(1)
引 言	(1)
第一章 唐诗范式的选择与宋初诗坛风尚	(11)
第一节 《文苑英华》与宋初的宗唐风尚	(11)
1.1.1 以类编次的体例和分体选唐倾向	(12)
1.1.2 选目反映的唐诗学思想	(16)
1.1.3 对唐诗清淡一脉的梳理和诗学范式的多元选择	(23)
第二节 “白体”与宋初的唱和诗	(29)
1.2.1 宋初诗人对白居易闲适诗风的欣赏	(29)
1.2.2 《二李唱和集》的宗白倾向	(34)
1.2.3 王禹偁由宗白到学杜的诗学转向	(43)
第三节 宋初的“晚唐体”诗	(48)
1.3.1 盛行朝野的隐逸风尚	(49)
1.3.2 对以贾岛为代表的晚唐清奇格调的学习	(51)
1.3.3 以郑谷为代表的晚唐流丽诗风在宋初的流行	(58)
第四节 “西崑体”的流行与诗风的嬗变	(63)
1.4.1 真宗朝诗风的转变	(63)
1.4.2 西崑体诗人对李商隐的学习	(70)
1.4.3 崑体后学对义山诗的再接受	(74)

第二章 李、杜、韩对北宋诗风变革的影响	(79)
第一节 对李白诗风的模拟和对杜诗的推重	(79)
2.1.1 士人的济世情怀与仿李的豪放诗风	(80)
2.1.2 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和学杜的写实批判精神	(88)
2.1.3 早期的李杜评论	(93)
第二节 对韩孟诗派的群体性接受	(102)
2.2.1 韩愈与宋体气格	(102)
2.2.2 崇尚怪奇的诗美习尚	(106)
2.2.3 议论化、散文化的创作追求	(110)
第三节 学习唐音与开启宋调	(115)
2.3.1 梅尧臣的平淡诗风与唐音	(115)
2.3.2 《唐百家诗选》与王安石诗学风格的转变	(122)
第三章 杜诗学与江西诗法	(131)
第一节 山谷诗法与老杜夔州以后诗	(131)
3.1.1 山谷体的拗律、章法、句法和字法	(132)
3.1.2 取意前人与用典之法	(144)
3.1.3 追慕老杜“不烦绳削而自合”之境	(147)
第二节 后山、简斋学杜的诗学史意义	(150)
3.2.1 陈师道学杜	(151)
3.2.2 陈与义学杜	(160)
第三节 杜诗学的繁荣与江西诗法的调整	(168)
3.3.1 对杜甫诗的校勘和注释	(169)
3.3.2 诗家笔法与诗圣情怀	(177)
3.3.3 学杜观念的变迁和江西诗法的调整	(185)
第四章 晚唐体与南宋江湖诗风	(195)
第一节 以唐人律绝为诗学门径	(195)
4.1.1 杜诗的新发现	(195)

4.1.2	求活法于唐人律绝	(198)
4.1.3	《万首唐人绝句》的编选与“二泉”《唐人绝句》的唐诗观 ...	(207)
4.1.4	对待晚唐诗的不同态度与对李杜气格的强调	(221)
第二节	四灵的诗歌创作与《众妙集》	(229)
4.2.1	诗学贾岛、姚合	(230)
4.2.2	《众妙集》与四灵的唐诗观	(238)
第三节	晚唐体与江湖派的苦吟作风	(243)
4.3.1	苦吟作风与《唐僧弘秀集》的编选	(244)
4.3.2	《三体唐诗》的唐诗学思想	(252)
第五章	以唐人为法与宋代诗学	(262)
第一节	从唐诗的山水清音到宋诗的“平淡”之美	(262)
5.1.1	宋人对唐诗山水清音的接受	(263)
5.1.2	“平淡”理论的成熟与诗学典范的选择	(269)
5.1.3	轻形重神的神韵诗论的出现	(274)
第二节	学杜观念的变迁与宋诗的格律声调	(281)
5.2.1	以豪纵论杜诗与近体诗气格的提升	(281)
5.2.2	对杜甫诗法的初步发见与学习	(285)
5.2.3	老杜诗法的辨析与江西诗派学杜经验的总结	(289)
第三节	对宋诗的反思与唐诗学建构	(296)
5.3.1	《沧浪诗话》与严羽的唐诗观	(296)
5.3.2	刘克庄以“情性”为本的诗学反思	(303)
5.3.3	法度论的复兴与学杜路径	(310)
参考文献	(318)

引言

宋调与唐音有明显的不同,但善于学唐者莫过于宋人,无论是创作风尚的演变,还是批评理论的发展,宋代诗学都蕴藏着取法唐人的创作经验,以及对唐诗审美特征的深入思考。从整体上看,唐诗与宋代诗学的关系存在着不可割裂的两个层面。一方面,唐诗作为宋代诗学的参照体系,在宋诗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曾起过非常重要的范本作用;另一方面,宋代诗学中涉及到的大量的唐诗评论,又是宋代诗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考察唐诗在宋诗学发生、发展进程中的影响机制,探讨诗歌自身发展规律制约下宋代诗学演进的内在动因,可以对唐、宋诗各自的特点,对宋代诗学中的一些现象、范畴以及理论问题,做出更为全面而合理的解释。

(一)

在有关唐诗和宋代诗学的关系研究中,受唐、宋诗优劣论的传统思维定式影响,学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唐宋诗的差异研究和特色评价问题上。如在 20 世纪第一部有关宋诗的系统研究专著——胡云翼的《宋诗研究》中,开篇首先讨论的就是唐诗和宋诗的差异与评价问题。之后,程千帆、缪钺、钱钟书等人也分别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和辨别。70 年代,毛泽东有关“宋诗不懂形象思维”的论断,引发了学界有关唐宋诗差异与优劣的讨论热潮。80 年代后,学术界逐渐摆脱了对宋诗整体评价的偏见,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有关宋代诗学的研究逐渐升温,已成为宋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出版了很多高水平的论著。这些研究成果在秉承文化视野的外部研究思路的同时,延续了唐宋诗传统研究课题留下的开拓空间,以唐诗为参照,从诗歌意象、文化意蕴、题材范围、创作追求和审美理想等多个角度对宋诗的艺术个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在唐宋诗特征的共时性比较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唐诗与宋诗之间历时性的继承因袭关系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在断代文学研究方面,张毅的《宋

代文学思想史》、程千帆、吴新雷的《两宋文学史》、韩经太《宋代诗歌史论》、许总的《宋诗史》、吕肖奂的《宋诗体派论》、张海鸥的《北宋诗学》等，在谈及宋代诗人的创作渊源时，均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唐诗对宋代诗学的深刻影响。莫砺锋的《江西诗派研究》、龚鹏程的《江西诗社宗派研究》以及张宏生的《江湖诗派研究》，对江西诗派与杜诗以及晚唐诗风与江湖诗格的关系，做出了更加细致的辨析和梳理。此外，赵仁珪的《宋诗纵横》列单章讨论宋诗与唐诗的关系，曾祥波的《从唐音到宋调——以北宋前期诗歌为中心》，考察了宋诗由因袭到自立的动态发展过程。除了这些与宋代诗学相关的专著，学界还有大量单篇论文涉及唐代诗人对宋诗大家的影响，涉及白居易、杜甫、李白、韩愈、孟郊、李商隐等唐代诗人，对王禹偁、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等宋代作家的影响。这种个案研究数量众多，有助于了解唐宋诗之间的继承关系。

以顾易生、蒋凡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周裕锴的《宋代诗学通论》为代表的宋代诗学理论研究，对唐宋诗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江西诗派学杜之法的概括上。近年来，通过对宋代诗话和唐诗选本中唐诗思想的考察，对宋代诗学走向及理论命题作出更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逐渐成为宋代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学界对于宋代诗话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岁寒堂诗话》、《沧浪诗话》等理论性较强的诗话著作中。宋代流传至今的唐诗选本较少，学界的成果相对有限，虽有筚路蓝缕之功，但有待于进一步的补充和细化。

传统的唐、宋诗之关系研究，往往将重点放在唐宋诗艺术特色的比较上，别异而不求同，对于唐诗在宋诗不同发展阶段的深刻影响缺乏整体性的梳理和探讨。另一方面，由于宋人整理的唐诗别集大量亡佚，而选集、总集的编撰又多带有资料汇编性质，缺乏统一严格的选诗标准，诗话形式的唐诗评论又比较零散，从而限制了学界对唐诗在宋代诗学发展进程所起作用的综合性考察。本书以唐诗与宋诗学的关系研究为宗旨，涉及宋人的诗歌创作、理论批评和唐诗选本等层面，结合对宋人编选的唐诗总集与别集的统计分析，由点到面，探讨唐诗对宋代诗人及创作风尚的影响。与此同时，对宋代唐诗评论中的一些核心范畴和诗学问题进行深入的系统论述，以揭示宋代诗学发展与唐诗接受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

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唯一可与唐音分庭抗礼的一种诗歌范式，宋调的确立和嬗变是在对唐诗的不断扬弃中完成的，其中蕴含着对唐诗最为鲜活、典型而丰富的认识和思考。研究唐诗在宋诗创作中所起的典范作用，揭示特定时代

审美风尚和学术思想影响下的宋代唐诗接受与宋诗建构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是宋代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

北宋初年是晚唐五代诗风在新王朝的沿袭期。建国伊始，太祖、太宗朝诗坛的创作主力，是一批由五代入宋的保留着浓厚旧时代文学习气的文臣儒士。在太祖、太宗强权政治的威慑和畏祸求全心理机制的驱使下，他们与同样追求乐天饱足的白居易达成了深度的心理契合，并在诗歌创作中对白居易流连光景，平易浅近的小碎篇什加以效法和模拟。如李昉和李至唱和往来结集而成的《二李唱和集》，将刘、白二人的次韵酬和之举发展到极致，蕴含在白居易平淡闲适诗风背后浓重的生命感慨和真挚情谊被彻底抽离，成为一种逞才任能的文字游戏。与白体诗相比，宋初的晚唐体诗内涵相对复杂，既包括取法贾岛、方干等晚唐苦吟诗人、风格孤峭清寒的五言律诗创作，还涉及学习郑谷、许浑等人的清丽流易一脉，二者虽同为晚唐诗歌的主导风格，但在创作方法与艺术风貌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真宗朝崇富心理的滋长以及崇道热情的高涨，导致诗歌审美风格完成了由清淡闲远到繁缛华美的更迭，以杨亿、钱惟演、刘筠为代表的西崑派诗人，从用典丰缛与词藻华美的角度对李商隐诗歌加以接受和仿效，亦步亦趋而不知变通，对于义山诗歌得自老杜的法度谨严与情思深渺注意不够。无论是白体、晚唐体还是西崑派，笼罩在一片学唐风气之中的宋初诗坛，自立意识和新变思维比较模糊，取法路径相对简单，对白居易、李商隐、贾岛等唐诗名家的理解和接受，还显得片面与肤浅，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宋初诗歌的艺术成就。

北宋立国后政治、经济、军事领域中的一系列隐患，在仁宗朝全面爆发为一场深重的社会危机，而通过科举选拔得以参与国家政治决策的寒门庶士的参政热情和使命意识，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激发。他们自觉继承韩愈由王道而师道的圣贤传承谱系，以思孟哲学的内圣之说完善人格修养和内在气质，将五代以来颓靡卑弱的士风扫除殆尽，诗歌创作也因此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在宋代诗歌发展的这一重要拐点上，李白、杜甫、韩愈的诗歌创作被视作楷模，有效的引导和规正了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李白诗歌的豪放风格引发了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郭祥正等众多大家的效法和仿拟，并最终在苏轼的古体诗创作中达到一种带有宋诗独特审美情趣收放自如的艺术境界。以“三吏”、“三别”为代表的杜甫的新乐府诗歌，以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等五言长篇的写实精神和批判色彩，也得到了这一时期诗人的高度肯定。效法老杜诗史笔法，反映生民疾苦、批判社会现实的讽喻之作大量涌现，代表了这一时期诗人接受杜甫诗歌的独特路径和审美视角，也导致这一时期诗人对于李杜二人为人为诗的误读。随着对杜甫诗歌艺术风格认识的不断全面和深入，以及宋代诗学由风格论向法度论的过渡，宋人对于李杜的认识也实现了由李杜并尊到

扬李抑杜,再到尊杜而不抑李的转变。此外,韩孟诗派崇尚怪奇、散文化、议论化的古体诗创作,被视作不平之鸣的最佳代言诗体,欧、梅、苏与王令等人的这类作品,在意象构思的险怪奇崛与以文为诗的创作实践上,与韩愈乃至李贺、卢仝诸人相比毫不逊色。对于杜甫诗法的初步发见,与对孟郊等中唐诗人以意为诗艺术经验的吸收,使梅尧臣和王安石在深入唐人风格的同时,对平淡诗美加以提升与纯化,完成了从效法唐诗的山水清音到追求宋人独特的平淡格调的转型。

北宋中期一系列变法举措的失败,以及随之兴起的朋党之争,打击了士人的济世热情,糅合儒释道思想于一体的内省精神与坎壈多艰的人生遭际,使元祐诗人回归到内心的省察和体认。人文素材开始取代自然山水成为诗歌表现的主要内容,创作方法由与自然兴感变为用意为先,记叙、议论、说明等散文的表达方式被进一步引入到诗歌创作中来。立意构思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日益突显,并逐渐凝固为一种诗歌的创作法则,杜甫诗歌的典范意义进一步凸现出来。不同于欧、梅等人取法杜甫乐府诗的写实精神,也有别于王安石将老杜诗法融化于绝句创作,黄庭坚的山谷体诗,专取老杜诗之句格和夔州以后诗而学之,强调对杜诗谋篇、造句、炼字、用典、拗峭之法的总结和效法,同时又看到了老杜晚年诗歌由格律精严进于不烦绳削的一面,实现了对其自身法度论诗学的突破和提升。被方回视为江西诗派另外二宗的陈师道和陈与义,则分别从诗法的化巧为拙和风格的瘦健生硬,以及沉郁壮阔的内在气格和体物切近的题材转换上,实现了对黄庭坚学杜的深化和调整,全面的展现出北宋末年效法老杜的整体风貌。与江西诗派的大行其道同步,效法老杜诗亦成为大量涌现的诗话著作的主题。在这些体制日趋成熟的诗话著作中,诗论家们在杜甫诗歌的收集整理、校勘注释,对杜甫诗圣情怀和诗史特色的概括,以及对学杜之法的总结和调整问题上,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这是杜诗学在南北宋之交极度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

南渡之后,面对江西后学学杜而不知变通的诗学状况,诗人们沿着吕本中、陈与义、徐俯等南渡大家所指示的路径,通过对杜诗体物缘情一面的发见,对江西诗法加以调整,最终在中兴诗坛的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诗学大家那里,落实为一种写景切近、流利浅易、偏重七言近体的效法晚唐的诗歌创作范式。叶适与四灵试图对其加以调整与矫正,拈出贾岛作为师法对象,宋初风靡一时的长江体在南宋末年实现了再次的勃兴。四灵通过对字句推敲的苦吟之法的强调、对清幽孤绝审美色调的回归,以及对五言律诗创作的偏重,实现对诗学晚唐的一种纠偏,但取法不高、眼界偏狭的痼疾,也使他们的诗歌陷入到气格卑弱的类型化的诗学困境而难以继。稍后兴起的江湖诗派,在五律创作中由贾岛之

寒峭,进一步演变为姚合之整饬圆熟,七律创作则学许浑之工整流利。至此,南宋诗学在创作模式上完成了由浅易流利到刻苦经营再到浅易流利的一次还原,然而中兴诸家内在充盈的豪迈气格,以及直接承袭自江西诗学的内在法格,已经成为难以复现的历史回响,宋代诗学至此走到了生命的终结。

宋代诗学理论中的唐诗评论,零星的见于宋人的诗话、笔记及文人交往的书信、序跋之中,主要是针对具体诗人、诗作的片断性、感悟式的诗学描绘,但就在这些只言片语之中,仍然不乏对唐代诗歌的准确把握,很多观点成为不易之论,为后世诗论家的进一步生发阐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北宋至南宋,对唐代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价,一直是宋代诗学理论建构的重要内容,诞生了包括张戒《岁寒堂诗话》、严羽《沧浪诗话》等在内的一批深入探讨唐诗特色的诗话著作。对唐诗审美特质、创作技法的理论研究,对宋代诗歌创作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同时也生动的反映出宋代诗学核心价值理念的变迁。本书坚持创作与理论相结合的文学思想史研究范式,将宋人的诗歌创作与理论批评结合起来,力图对唐诗在宋代诗学演进过程中的影响机制作出更为全面而连贯的考察。

(三)

唐诗学是一门有关唐诗研究的学问。借鉴唐诗学的选本研究方法,通过对唐诗选本的统计分析概括选家的诗学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拓展宋代诗学研究的范围,使我们对唐诗与宋代诗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做出更加全面,更接近历史原貌的理解。

宋代的唐诗选本数量可观且各具特色,据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统计,宋代唐诗选本共有三十二种,但大多已亡佚,今天可见的有《唐百家诗选》、《声画集》、《万首唐人绝句》、《谢注唐诗绝句》、《众妙集》、《唐僧弘秀集》、《三体唐诗》以及《分门纂类唐歌诗》八种。这些宋代的唐诗选本,从接受层面直接体现着宋人在不同阶段对唐诗的取舍态度。而《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一系列大型诗文总集的编纂,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宋人在收集、整理、保存唐代诗歌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文苑英华》是在宋太宗主持下,由李昉、宋白、扈蒙、徐铉等人历时五年编纂而成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共一千卷,第一百五十一卷至三百五十卷(共二百卷),选录梁末至五代诗歌近万首,其中唐代诗歌 9367 首,集中反映了北宋初年宗唐学唐的审美趣向。此书将近体诗、五言古诗与乐府歌行体诗歌区分开来加以选录,表现出模糊的分体选唐倾向。就选目来看,宋初馆臣对初唐宫廷应制诗十分重视,而与这种颂美之音相左的唐代写实主义讽喻诗派,则很难唤起

这一时期馆阁诗人的共鸣。选家对初唐宫廷诗歌的大量选录,向我们真实的展现出白体、晚唐体诗歌盛行的太祖、太宗朝的诗学思想,与真宗朝崑体诗派之间隐性的内在关联。受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以白居易和贾岛为代表的中晚唐清淡闲远诗风,在宋初实现了自然的延续。宋初诗人学白、学贾,进而上溯至初盛之交的宋之问、张说、张九龄,盛唐王孟田园诗派以及大历十才子和江南作家群,对唐代诗歌追求清淡一脉进行了梳理。基于这种追求平淡清远的文学思想和审美品味,唐代诗歌中风骨劲健、险怪豪纵、绮媚秣丽风格的诗人诗作,均遭到了宋初馆臣的误读和摒弃。

太平兴国四年姚铉编纂的唐朝诗文总集《唐文粹》,是真宗朝后期兴起的复古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中的一项重要成果。全书共一百卷,诗歌部分仅有十三卷。在如此有限的篇幅中,姚铉共选录唐朝 150 多位诗人共千余首诗歌作品,真实的反映出在明道宗经的学术背景下,宋人对唐诗的接受维度。其中对于中唐元白、张籍等人乐府辞的集中选录,对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不加删汰的全文收录,以及张九龄《感遇》、李白《古风》、吴筠《览古》、李华《杂诗》和《咏史》、白居易《续古诗》、陆龟蒙《杂讽》的选入,都可以视作北宋中期写实批判精神复兴的一个前导。

《唐百家诗选》是北宋中期一部重要的唐诗选本,编选者王安石作为庆历文坛的创作主将,以唐诗选本的形式对北宋中期诗学的发展线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梳理。基于对写实讽喻精神和复古诗教观念的认同,王安石对唐代,尤其是以王建为代表的中唐乐府诗加以集中选录。以高适和岑参为代表的盛唐边塞诗派在选目中的凸显,也表现出王安石对兴于北宋中期的豪纵怪奇诗风的独特思考。宋初诗坛对中晚唐清幽闲远诗风的效法也延续到了北宋中期,在追摹唐代山水清音的发展脉络中,王安石尤重盛唐与大历的选录倾向,集中地反映了他对宋初宗唐路径的深刻反思,也为他在学习唐代诗歌山水之美的基础上,以深婉不迫的荆公体开启宋代诗歌独特审美格调奠定了基础。

南宋是宋代唐诗选本的繁荣时期,现存的八种唐诗选本,有七种出于南渡之后。中兴前后出现的《万首唐人绝句》和《唐诗绝句》,是这一时期诗人取法晚唐绝句诗学思想在唐诗选本中的总结。洪迈编纂的《万首唐人绝句》,是一部规模庞大的唐代绝句专选集,全书共有一百卷,其中七言绝句七十五卷,五言绝句二十五卷。共收诗歌 9957 首,其中七言绝句 7443 首,五言绝句 2476 首。洪迈竭泽而渔的收集整理,虽然没有直接给我们指出效法唐人的具体路径,但其以唐代绝句尤其是七言绝句作为选录对象的编纂思路,本身就已经表明其取法中晚唐、尤其是晚唐的诗学倾向。而通过具体的选目,洪迈也向我们清晰地勾勒出唐代五、七言绝句的发展脉络。

南渡以来,在江西后学对江西诗法的不断调整中,效仿老杜炼字、炼句之法的思维模式日趋僵化逐渐被诗人摒弃,而对于艺术构思之“意”的强调,成为吕本中“活法”说的精神内质,被以韩洙和赵蕃为代表的江西后学继承下来,并在绝句、尤其是七绝这种体格最为短小、最讲究谋篇之法的诗歌体裁中,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和运用。二泉编纂的唐代七绝专选集《唐诗绝句》,虽然没有明确的论诗之语,但是通过对恪守起承转合之法,句句枢纽又特重三、四两句转折、收束之功的名篇佳什的选录,集中的表现出在晚唐诗风大兴的诗学背景下,江西后学试图模糊江西与非江西作家之间的差异,由唐绝上达老杜的独特诗学思考。这些唐诗绝句选本与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朱熹、姜夔、张镃等中兴诗人的创作主张一起,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指导。

赵师秀编选的《众妙集》是对四灵学唐经验的一次全面总结。在大量选录同样效法贾岛、姚合的众多晚唐诗人、诗作的同时,中唐入选诗人数目仅次于晚唐,人均入选诗歌数量甚至超越晚唐位居第一。其中,主要活跃于大历时期的十才子诗人群体,以及江南诗人群又远远超过了贞元、元和诗人,成为中唐时期入选诗人的主体。同时,赵师秀还选录盛唐诗歌 19 首,不仅包括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王维、孟浩然、綦毋潜,对于擅长边塞题材创作的岑参诗歌中的清绝之美,也有着充分的认识和把握,在一定程度上标明其不止步于中、晚而要求上达盛唐的诗学追求。此外,赵师秀还在初唐诗人中选取了沈佺期和张循之二位诗人的三首诗歌,明确的勾勒出了唐代山水诗的发展轮廓,即自初唐沈宋到盛唐王孟和大历诸家,再到晚唐姚贾。

江湖诗派的五律创作延续四灵取法姚贾的诗学路径,江湖诗人李龔准确把握到了僧人身份与贾岛诗歌艺术特色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唐代诗僧作为切入点,编成唐代僧诗选集《唐僧弘秀集》,共选录 52 位诗僧的 500 首诗歌作品,对南宋末年长江体诗歌的盛行与诗僧创作的高度繁荣等诗学现象,作出一定程度的总结和回应。在对五律加以集中选录的基础上,李龔对古体诗,尤其是歌行体古诗予以凸现,反映出他对江湖诗派苦吟之法的反思和引导。

五言更趋近于姚合之整饬清圆,与效法许浑七律之工整圆熟,是江湖诗派针对四灵诗学思想作出的一种调整和超越。对此给予诗学总结的是另一位江湖诗人周弼,他编选的《三体唐诗》共选录唐代 153 位诗人的 458 首诗歌作品,选录视角依然集中于晚唐,只是选录重点已经实现了由贾岛、姚合到杜牧、许浑的转变。鲜明的体裁意识以及独特的体例模式,使《三体唐诗》表现出强烈的理论色彩和法度意识。诗人在选目提出五律、七律、七绝三体诗歌创作的若干条法度要求,并在其后一一以唐代诗歌作为验证,这样就将诗话著作中的摘句批评模式应用到选本中来,形成一种较为成熟的唐诗选本体例模式。在诗学思

想上,周弼特重情景二端、虚实二体,追求二者在诗歌中的平衡和匀称,从而达到一种“饱满”而不失“灵动”,“遒”劲而又飘“逸”的中和之美。这是在南宋以来缘情体物诗学观念复兴的历史背景下,对于江西法度论的一种借鉴和延续,对后世的唐诗评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

从整体上看,唐诗对宋代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的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一、在对唐代诗歌中山水清音的效法和追索中,宋人将宋型文化内敛绝俗的艺术气质贯注其内,最终形成一种“平淡”的美学品格和艺术风调。二、作为最受宋人关注的唐代诗人,杜甫诗歌在宋代的接受,经历了由崇尚气格到标举诗法的转变,并最终在奉老杜为诗家宗主的江西诗派那里,形成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宋调典范。

在赵宋王朝创建伊始,宋初诗人就已然形成了一种沉静淡然、乐天知命的中年心态,山林隐逸之风大兴,白体诗平静悠闲的淡泊情趣,以及晚唐体清幽孤绝的意境氛围交相辉映,形成了一种崇尚平淡清远的时代性艺术追求。北宋中期的梅尧臣和王安石,将宋人独特的审美情趣糅合于对唐代山水清音的效法和学习之中,宋诗与唐音和而不同的“平淡”之美至此面目始具。就梅尧臣而言,他的平淡诗美追求,不仅包括对陶、孟乃至大历诸人山水田园诗歌审美境界的仿效,同时也涵盖了对中唐孟郊等人以意为诗的人工之法的学习,从而形成了一种与盛唐诗歌及时性圆融浑然的审美体验不同的、带有一种线性绵延和苦涩之感的“平淡”品格。而王安石“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平淡追求,则直接针对中唐诗人张籍而发,通过在晚唐清绮婉媚风格内贯注以老杜的字法、句法,达到浑然天成的自然境界。

熙宁新法的失败和朋党之争的激化,使宋代诗人在对庄学禅理的反思中再次回归内心,以苏轼和黄庭坚为代表的元祐诗人,在对王维、孟浩然、柳宗元、韦应物乃至陶渊明的接受中,将“平淡”概括落实为一种“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的美学品格。黄庭坚论诗重法,尤喜老杜夔州以后不烦绳削而自合的诗学境界,他提倡的“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也就带有了浓厚的法度色彩。杜甫重神重骨的诗学思想,与宋人由崇尚清淡到追求平淡的美学理念,遵循着相同的思维模式。沿着这条诗学路径继续向前推进,导致了两条迥然相异的创作理路:一种是在传统意境论诗学语境内对写物之神与写景之韵的强调;而另一种则形成江西诗派以法论诗的诗学模式,开启了宋代诗学中独尊老杜的时代。

杜诗对于宋诗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宋初诗人对杜甫的标举,主要立足于

对其忠君悯民的爱国情怀的肯定以及对其坎坷不平人生境遇的同情。到了北宋中期,人们将杜诗视作其于艰难遭际中爆发出的不平之鸣,对其新乐府诗歌的讽喻精神和写实品格加以继承的同时,将豪纵作为杜诗的主导风格加以品评和学习。欧阳修不仅在古体诗上效法杜甫,还将杜甫之诗视作提升宋初白体、晚唐体等近体诗歌内在气格的不二法门。这一时期的诗人开始有意识的突破宋初诗歌集中刻画馆阁楼台、羁旅行役中细琐之物的狭小视野,更偏爱对壮大场景和雄豪气象的描绘,竭力在诗中营造一种雄伟混茫的开阔意境。但是,从客观上来看,欧阳修等人对杜甫诗歌主导风格的认知还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而对杜诗收集和整理均作出重要贡献的苏舜钦和王安石,在对杜甫诗歌风格的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对杜甫诗歌炼字、对偶、用典之法进行了初步的发现和总结,从而为以黄陈为代表的宋诗典范的形成,为江西诗派的诗歌创作和诗学建构奠定了基础。

除了在创作中践行杜诗格律,南北宋之交涌现的大量诗话著作,对杜诗的法度模式以及江西诗派的学杜经验进行了集中的总结,范温的《潜溪诗眼》,惠洪的《冷斋夜话》,黄彻的《碧溪诗话》,以及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到了南宋,诗学主题由法度论到体物兴感的转变,使得以陆游为代表的中兴诗人对杜诗认识的侧重点,再一次回归到对其气格之豪纵的肯定上,并将其与李白、高岑等盛唐诗人一起视作矫正晚唐颓靡诗风的有利武器。

尚兴感与崇法度,学晚唐与重气格,多种学唐思路在南宋的此消彼长,为宋末的诗论家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学唐经验和更加宽广的诗学视野。南宋末年,以严羽《沧浪诗话》、刘克庄《后村诗话》、范晞文《对床夜语》,以及魏庆之《诗人玉屑》为代表的一批诗话著作相继问世,在从不同角度对宋代诗歌发展的整体脉络进行反思的同时,完成了宋人唐诗学体系的初步建构。《沧浪诗话》针对江西恶习,继承南宋以来崇尚自然兴感的诗学思维,并用“妙悟”与“别才”、“别趣”等范畴对其加以提升,形成了中国古典意境论诗学体系的经典性话语模式。严羽吸收了宋代诗学中以豪纵论杜诗的有益经验,标举“盛唐”这一时间断限,将李杜与王孟统一在一个共同的诗学背景下,在学杜与学唐这两条宋代诗学的主导路线中找到一条折中之路,作为宋末四灵与江湖诗风的纠偏之法。刘克庄则从传统的儒家诗学中拈出“情性”一词,作为高雅冲澹、雄壮浑成两种诗学风格在创作主体论上的理论支撑。这样一来,无论是唐代山水清音,还是杜诗之沉郁顿挫,只要发乎情性便无矛盾可言。基于这种认知,刘克庄在效法唐人上表现出一种更加开放与通脱的态度,提出“融液众家”的学诗之法。

与刘克庄同时的诗论家,除了强调杜诗的内在气格以求在唐音与宋调间达到平衡和折中,还将贾岛视作唐代山水清音与法度论诗学的交叉点,通过对贾

岛苦吟之法的学习上达老杜诗格的诗学考量也逐渐明晰,最有代表性的诗学著作就是魏庆之《诗人玉屑》。范晞文的《对床夜语》继承了周弼以情景、虚实论诗法的诗学观念,并将其运用于对老杜诗歌的解说与鉴赏中,代表了对宋人效法唐诗两条基本线索加以调和的又一种思路。老杜“篇终接混茫”的唐诗风范再一次被还原为江西诗学的法度井然和锻炼精深。